

《東華漢學》第 22 期；233-234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5 年 12 月

學苑春秋

近二十年來期刊論文的發表蔚為主流，專書寫作的意願以及經典性的專著出版，遂相對地受到壓抑，有鑒於此，科技部（原國科會）開始推動人文專書寫作的計畫，臺灣中文學會亦特別嚴選一些具備精緻性與系統性的學術專書，展開一系列新書精讀會的活動，期能透過多次提問與深度對話，來改變目前學術研討會蜻蜓點水的討論模式，並要求報名者購書閱讀，以利參與討論，避免如目前學術研討會般，發表者的論文往往只有講評者得以先行閱讀，無法擴大學術討論的效應。三年來的苦心經營，新書精讀會的活動已在全臺各大學遍地開花，其會議記錄除刊載於臺灣中文學會的會訊之外，亦邀請討論人之一撰寫學術書評，進而發表在重要學報，以發揮深度傳播的效應，這樣的合作模式已逐漸為學界所關注重視。

本校華文系十分榮幸承辦第八場新書精讀會的活動，這一場的選書是梅家玲教授的《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麥田出版社，2013），活動當天由須文蔚教授主持，邀請陳平原教授、吳明益教授、黃宗潔副教授三位學者共同討論，時間為2014.11.26（日）13：30-17：30，地點在臺灣大學中文系會議室，當天除了作者、主持人、三位討論人之外，中國社科院黎湘萍教授、中正

大學黃錦珠教授亦蒞臨討論，現場中尚有多位對現當代文學有興趣的研究生以及任教於中學的國文科老師們，整場精讀會的討論相當熱絡有趣。

黃教授這一篇書評，一則以「回眸與展望」處理多重時空座標下的「中國現代性」，二則以「從國體到身體」，探索臺灣文學裡的家國認同，不僅有梳理引導之功，亦發揮了學術評介的力道，值得參考。

《東華漢學》第 22 期；235-244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5 年 12 月

從「國體」到「身體」：現代性下的想像認同 ——《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評介

黃宗潔*

一、前言

梅家玲的《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一書，如其導論所言，乃是對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以「青春」為核心的文化政治學之探索。綜觀本書的幾個關鍵字：少年、成長、青春與國族，可以發現它們不只是二十世紀以來中文小說著墨的重點，對於當前社會的現狀亦有若干可相連結與思考之處。因此，書中各章所論及的文本雖在時間與地域上有所不同，但每個年代與國家社會在面對需要解決的狀況時，其中所觸發的內心焦慮和回應形式，有時卻是非常類似的。用這樣的角度觀察晚清以來面對現代性衝擊所衍生出的不同回應方式，以及思考在這些「不同」當中，是否有某些非常核心的共同焦慮與應對模式，這樣的焦慮與應對又是否可能衍生出新的問題？乃是本書論述所開啟之深具意義的思辯與對話空間。以下分別就「少年中國」與

*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少年臺灣」兩個部分，評述本書如何展開以「國體」與「身體」為中介的，現代性下的想像認同。

二、回眸與展望：多重時空座標下的中國現代性

時間和空間向來是理解現代性議題的關鍵，本書第一章就相當細緻地透過觀察時間與空間概念的交互作用，梳理出現代性下認同的複雜面向。此亦為支持全書理論架構的關鍵篇章。

梅家玲從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所開展的，「發現」少年的積極意義，以及此種「肯定少年」的態度如何「投射為不同的國族想像」¹，指陳少年在此語境中成為一種抽象精神意義的特殊現象。「發現少年」，可以是青年以行動振興國體背後的理論基礎，也可以是小說教育、甚至兒童啟蒙的美好想望，但是這種「一個少年，各自表述」的狀況，誠如書中所指出的，反倒映照出由孩童、少年、青年共同構築的，看似積極美好也朝向同一目標的追求，內在的矛盾與疏異性。於是不只中國，少年成為一個漂移的時空座標。因此：「所謂的『少年中國』，其實乃是一重新『自我命名』的召喚行動。」²

建立具有新時代國際觀的「新中國」，看似積極熱血、展望未來，理應符合線性時間觀的「進步」想像，何以最後卻顯得漂浮猶疑？那是因為此一重新召喚與命名的行動，蘊含著太多互相矛盾與衝突的理想與價值之角力。一方面，如本書第三章〈孩童，還是青年？〉所指出的，革命與啟蒙的召喚在本質上追求某種一蹴而成的「躍進」，但「重視『時效』的另一面，其實是『日常時間性』的消亡，……無論是『教育』，抑是『成長』，其完成，都有賴於『日常時間性』的積累；一旦抽離，

¹ 梅家玲，《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臺北：麥田出版社，2013），頁9。

² 同前註，頁34。

『啟蒙』便只能以靈光乍現的姿態，開啟當下的頓悟。」³除了積累或頓悟的衝突外，當「進步」的底蘊實乃「恢復往日榮光」的期盼時，此種時間上的矛盾更成為無法擺脫的必然。因此，梁啟超所召喚的少年中國，注定陷於這樣的兩難：

它在全球化的空間想像中同時認同並欲望現時的歐日強國，以致於將它挪移至時間軸的前端，作為自己「未來」的行進目標；但另一方面，三代唐虞，漢唐康乾，又以其曾經輝煌燦爛過的文治武功，在時間軸的「過去」形成另一魅惑，召喚它殷勤回首，溯迴從之。甚至於，儼然成為另一形式的「未來」。也因此，如何由「帝國」而「中國」，由「老大」而「少年」，遂不能止於一往無回的單行進程，而是不得不在一再瞻前顧後之中，盤旋迂迴，游移赳赳。⁴

這樣的迂迴往返，並非梁啟超個人在建構理想中國的典範時思慮不周或不夠堅定所致，而是相當典型地呈現出彼時知識份子在面對現代性的挑戰時，必然遭逢的價值衝突與徬徨困惑。羅鵬（Carlos Rojas）以視覺為核心討論中國現代性的專著《裸觀》，亦有類似的觀察。他認為「中國現代性並非不證自明的概念，而是持續不斷的投射認同、預期回返，以及回返預期的產物。」⁵並指出：「晚清時期企圖將身分認同建立於一個更早的中國文化傳統的內在回歸，而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則逐漸傾向關心自己在外邦人眼中的形象，……當時引薦進中國的各種『西方』視覺再現科技與手法，例如攝影、電影，與西方藝術，則強化了這種對抽象西方凝視的關切。」⁶對於內在回歸與西方凝視的雙重在意（及焦慮），實為晚清到民初知識份子的共同困局。

³ 梅家玲，《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頁 150-151。

⁴ 同前註，頁 42。

⁵ 美·羅鵬（Carlos Rojas）著，趙瑞安譯，《裸觀：關於中國現代性的反思》（The Naked Gaze: Reflections on Chinese Modernity）（臺北：麥田出版社，2015），頁 32。

⁶ 同前註，頁 141。

由這樣的觀點出發，我們方能理解〈小說教育〉此章中提到的，何以晚清以來的翻譯小說總是把西方作品挪為己用的狀況。例如包天笑翻譯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所撰《愛的教育》為《馨兒就學記》，並於書中穿插掃墓等若干原書不可能出現的情節，此種「譯述本土化」，將想像的西方進步世界在小說中轉化為中國舊道德的「在地實踐」，誠為中國回應現代性衝擊的獨特遺跡。如此一來，「整部小說的人物是中國的，文化語境是傳統的，但所開展的教育視界，所見證的少年成長，卻是西方的、進步的、現代的」⁷。回眸與展望，遂成為當時中國建構想像認同反覆迴旋的主旋律。

除此之外，當時另一些以「新」為名的續作，或是某些烏托邦小說，則是種有趣的對比。無論是因八股文之毒而得病，之後全家移民到月球讀書的《月球殖民地小說》，或《新石頭記》中林黛玉留學西洋，成了哲學與英文教授，還鼓勵賈寶玉到日本讀書再回國辦學堂的情節，若以文學性觀之，或許顯得荒誕有餘價值不足，但裡面所展現出的，以留學或移民做為實踐新理想的形式，也讓我們看到「移動」做為回應現代性衝擊、以及建構家國認同想像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羅鵬亦曾以《鏡花緣》一書為例，指出其中的流放主題值得關切，「家的親近感置換為流放的疏離感」⁸固然不是該書獨有的特色，但正因「小說本身也可被視為一面『鏡子』，反射出它所再現的外在社會現實」⁹，若將《鏡花緣》置於晚清以來的小說系譜中，就可發現那一離本鄉就會痊癒，「投奔外邦，方能有命」的「離鄉病」，和《月球殖民地小說》當中要由「外國」醫師方能清洗的八股之毒，實為同工而異曲，提醒空間的流動在建構認同時不容忽視的重要性。

⁷ 梅家玲，《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頁92。

⁸ 美·羅鵬(Carlos Rojas)著，趙瑞安譯，《裸觀：關於中國現代性的反思》，頁59。

⁹ 同前註，頁61。

三、從國體到身體：臺灣文學裡的家國認同

如果說，清末民初的論述與小說透過「少年」所相望的，是「新中國」「國體」的再建立，臺灣文學在建構家國認同時，則更清楚地意識到這個移動的「主體」，也就是「身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書後半部有關臺灣文學的討論，可以清楚看出無論日治時期或五零年代之後的臺灣文學，咸具有某種在地與移動之間的角力與對話關係，而「身體」則以其「病體」或「不合主流社會價值的情欲身體」，尋覓安身之所。〈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一章，便析論了日治時期文學作品中，病弱的知識份子與少年形象，及其對理想的追求。如同史書美（Shu-mei Shih）在《視覺與認同》一書中所言，「流動的方向永遠帶著歷史的印記，……受限特定時間與空間的交會點（conjunction），亦即有其時空型（chronotope），會依脈絡的不同而持續變動」¹⁰。因此，相較於在回眸與展望間反覆游移的中國少年，臺灣從日治時期以來家國認同與理想建構的途徑，既有其面對「現代性」時間的類似焦慮，亦自有獨特歷史脈絡下的印記。由此觀之，本章析論的作品之一，1922年刊登於《臺灣》雜誌上的〈她要往何處去〉這篇小說，其中的臺灣少女桂花，在留日的未婚夫要「破除舊制度」而解除婚約後，體悟到這是社會制度的錯，最後選擇跟隨表兄的腳步到東京留學的種種情節安排，就同時具有與中國少年類同的，以「移動」、「留學」做為進步想望的追求，而其留學的地點「日本」在這些作品中所代表的意義，則又必須回到臺灣的歷史脈絡才能更深入地釐清。換言之，當時各種類型的知識青年形象：無論是「在地」的「人在臺灣，心向日本」¹¹；或「歸來」的「懷著啟蒙者的使命感，去教化

¹⁰ 美·史書美（Shu-mei Shih）著，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78。

¹¹ 梅家玲，《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

本島同胞」¹²；又或者那些「或病或死，氣息奄奄」¹³；或因參加「志願兵」的身心鍛鍊而「轉弱為強」¹⁴的身體，所共同編織出的，不僅僅是迥異的身體形象與文學想像，更「投射出殖民地臺灣的多重認同困境」¹⁵。透過這些在不同空間中移動、往返，在強健與病弱之間懷抱希望與絕望的身體，我們方能理解，認同的建構從來不會是一件簡單，且通往唯一標準答案之路：

日本與臺灣，城市與鄉村，左翼關懷與布爾喬亞意識，不同的意識型態與文化政治，是如此縱橫交錯，駁雜難分。無論是改造抑被改造，輾轉於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間之中，青少年正是以自「身」的往來趨避，點滴「體」現著殖民地臺灣的認同流轉，身世滄桑。¹⁶

至於本書最後兩章，則由白先勇的《孽子》開啟一場背離傳統「以父之名」的，父權中心想像的家國認同之追尋，並將這樣的背離可能，回歸到自身身體和情欲的認同。由過往討論認同時偏重外向性輻射以定位「我（族）在世界的位置」，回歸到自身身體之內向性的挖掘，解構並重新定義傳統對於「家」的概念。但此種向內的挖掘，又不可能自外於對外界凝視的意識，因此，當代以身體情欲為核心的認同建構，只會加倍複雜。君與父，國與家，其間投射的認同想像本就相互糾葛，〈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臺北想像〉一章，遂將白先勇在《臺北人》與《孽子》等作品中，「中國」與「臺灣」之間「既互相建構，也相互消解的弔詭關係」¹⁷，納入「少年」此一元素進行思考，從而發現其中的家國認同與青春論述實互為表裡，再將情欲模式置入，其間的交互作用正訴說著「身分認同」的多元集合與動態流轉。誠如范銘如所指出：

論述》，頁 168。

¹² 同前註，頁 169。

¹³ 同前註，頁 175。

¹⁴ 同前註，頁 181。

¹⁵ 同前註，頁 188。

¹⁶ 同前註，頁 190。

¹⁷ 同前註，頁 206。

主體除了各種身分的競逐之外，還要考慮主體在空間中的定位與位移，以及連帶牽動的主體身分變動關係。……身分空間原型不僅是置位與越界的迭替，與其說是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與再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演化，我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是，身分空間持續進行著刮除重寫的過程。……在不斷的覆蓋中，即使最明顯呈現的是最符合當下文化論述和自我認同的優勢身分空間，卻可能保留著某些障蔽湮滅過的遺跡和似乎不可考的疑團。然而這些被忽視、壓抑、遺忘的身分空間總會在某些片段的詩文、傳說或夢境中依稀閃動，或者等待下一次身分地理板塊碰撞中，從記憶或潛意識的底層翻躍出來成為新的歷史地表。¹⁸

「刮除重寫（palimpsest）」這個原本來自精神分析的詞彙，對於理解身分政治的複雜性而言，實在相當適切。只有了解認同的建構來自多重身分空間的重疊、推擠、拉扯或刮除，而每一層「被刮除」的認同又隨時可能捲土重來，方能體會某些看似曖昧、「缺乏堅定信念或認同」的文學作品背後所反映的，認同的多元與流動性的價值。

如果我們期待當代對於身分認同的想像，願意走向這樣更能包容不同價值的路徑，本書最末章〈孤兒？孽子？野孩子？〉以吳繼文《天河撩亂》的討論作結，似乎帶來了打破傳統家國想像的新可能。《天河撩亂》中，透過主角時澄和「姑姑」成蹊的情欲身體、跨性別身體與染病垂死病體的生命「體」驗，提出了一種超越身體性與對傳統家庭觀念的徹底顛覆，成蹊最後在病床上對時澄說的這番話，可說是當代臺灣文學在性別與家族此一主題上的經典段落：

說來奇怪，也有點可笑，我有愛人，也有許多朋友，可是只有你讓我實實在在感覺到「家人」這種東西。不是所謂血緣上的家人，也許是你出現的時候吧，正好是我的身體和心理都跨越了一大步，邁向另一個成熟的當口，我第一次覺得我是一個母親，而你

¹⁸ 范銘如，《空間／文本／政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 91-93。

是我無性生殖的產物，我的孩子，我們屬於只有兩人構成，卻完整具足的特別家族。¹⁹

當然，如同梅家玲所提醒的，該書略帶宗教性與詩情化的「度脫」之道，也可能「暗示了現世中父子家國論述的牢不可破，令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²⁰，但無論如何，對於傳統性別與家國概念的「刮除重寫」，確實仍在進行中。

觀諸當代臺灣文學，相較於《孽子》或是《天河撩亂》所開展出來的，有關離家、無以為家、家變或重新定義家之想像、打破血緣連結的家庭觀，以及表現傳統家庭結構在當代社會的某種崩壞等等，在目前的性別與同志文學中，皆有優異的承繼者。另一方面，其實也有若干作者開始思考「同志回家」這樣的路線，嘗試回到和原生家庭對話的脈絡之中。這樣的路線表面上可能看似保守，但從另一種角度看，也可能是一種更坦然地建構家的多元想像的可能。因此，在2000年之後的臺灣文學，對於少年、家國、認同的想像，是否又面臨了更多元的挑戰，還是回到了一種傳統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文學如何與當代的社會議題對話，均是由本書所開啟的，期待與仍待更多討論的領域。

四、小結

梅家玲此書所討論的文本，橫跨晚清中國到當代臺灣，時空跨度不可謂不大，每個文本時空自然也有其當下要回應的特殊命題：晚清要面臨的現代性挑戰，與今人要處理的全球化視域當然不可能相同。但如同本文所嘗試指出的：若我們將眼光聚焦在少年、空間、移動、視覺、性別及其與認同的交互作用時，或許會訝然於不同時代與文化的社會，要

¹⁹ 吳繼文，《天河撩亂》（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93-94。

²⁰ 梅家玲，《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頁 271。

回應和解決的議題其實如此類似。晚清以來將「少年」視為理想化的標誌，各自想像與各自表述、並各自重新自我命名的狀況，何嘗不能在當代找到足堪對話的語境？青春承載著進步的想像與召喚，但傳統的幽魂不散，所謂的「進步」也可能意味著變動與不安，於是，理想自我的形象遂如鏡影，在反射與投射之間層層疊疊，曖昧難分。如果我們能了解這種在看似同一的理想化認同標記底下，其實包容著無數的殊異與各自定義的差異光譜，以及在朝向未來的想像中，那種回顧與前瞻、過去與現在，看似線性發展實則循環往復的時間意識，或許更能帶領我們朝向一個較為寬廣的實踐場域。

另一方面，當前臺灣所面臨的，乃是伴隨移動而來的全球化、移工、與人口結構的重整，這些變化都帶來更複雜的城市與鄉村關係之變遷，以及身分認同的辯證。我們如何丈量自身，在不同意識型態和身分角色的認同中游移，尤其是，如何看待他者？都成為新的課題。相較2000年之前的文本所呈現的景觀，在新的世紀，除了臺灣與中國之外，那些在我們周遭，已然成為「我們」一部分的「他者」，例如東南亞的移工與新移民，帶來了新的流動與家庭結構的變化，這樣的變化事實上也會回頭衝撞當地的現代性想像，以及某些必然伴隨而來的代價。因此，所有在地的認同都需要一個更具包容性的視野，而這樣的視野和眼光，必然從回頭凝視自身，認識自身開始。循環往復也好，矛盾曖昧也好，認同的建構原本就是個永恆且沒有固定答案的課題，但透過這每一個掙扎困頓的鏡影，我們終將在差異與類同之中照見自己。